



1902—1937年

北京的妇女救济

——以官方善业为研究中心

孙高杰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著作获得中共大连市委党校资助出版

1902—1937年 北京的妇女救济

——以官方善业为研究中心

孙高杰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2~1937 年北京的妇女救济：以官方善业为研究中心/孙高杰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615-5137-0

I. ①1… II. ①孙… III. ①妇女—社会救济—研究—北京市—1902~
1937 IV. ①D69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74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7.75 插页:2

字数:318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北京下层妇女的生活	21
第一节 下层妇女的职业生活	21
一、就业空间狭小	21
二、劳动妇女收入微薄	28
第二节 下层妇女的家庭生活	33
一、生活日益困窘	33
二、家庭的牺牲品	39
小结	48
第二章 清代北京传统的妇女救济	49
第一节 养老济贫措施	49
一、养济院和普济堂	49
二、粥厂和暖厂	55
第二节 嫠妇的救恤	58
一、清节类善会善堂差	58
二、清代北京的清节类善堂	61
三、八旗孀妇救济	68
小结	73
第三章 清末北京妇女救济的变革	74
第一节 晚清社会救济的转型	74
一、西方近代社会救济思想的传播	74
二、原有救济机构的衰败	76
三、社会舆论的积极推动	78



第二节 近代女性观念的转变	82
一、传统文化的自省	82
二、西方现代女性观念的传播	83
第三节 新型妇女救济形式的出现	91
一、女工厂的兴起	91
二、北京济良所的建立	97
小结	106
 第四章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妇女救济	108
第一节 舆论推动下的妇女救济政策调整	108
一、解放不幸妇女的舆论	108
二、救济不幸妇女的政令	116
第二节 妇女救济机构及其管理	123
一、妇女救济的管理	123
二、妇女救济机构概况	126
第三节 主要妇女救济机构的救济活动	130
一、济良所	130
二、妇女习工厂	154
第四节 救济效果评价	168
一、不幸妇女的“娘家”	168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72
小结	182
 第五章 “教育救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救济	183
第一节 政府主导角色的强化	183
一、行政管理的加强	183
二、政策法规的充实	190
第二节 “教养兼施”的实践:主要妇女救济机构的救济活动	201
一、妇女习艺工厂	201
二、妇女救济院	207
三、北平妇女协会	225

第三节 救济效果评价·····	231
一、管理的科学化与人性化·····	23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237
小结·····	240
结 语·····	241
参考文献·····	247
附录一 清代粥厂、暖厂、栖流所及各类善堂统计表·····	261
附录二 1913—1927 年济良所部分收容妇女情况表·····	264
附录三 1918—1928 年妇女习工厂部分收容妇女情况表·····	271
附录四 济良所收容、择配所女的执据及保结·····	276
附录五 妇女救济院院女结婚照片·····	277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在近代社会新旧嬗变的过程中,妇女解放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一幕。在以往关于清末民初妇女史的研究中,史家的目光多聚焦于这一时期以妇女解放运动为主线的各类事件,如女子教育、女子参政、废除缠足等等。关于妇女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局限于知识阶层妇女,千千万万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妇女,往往在这些宏大主题的叙述中被淹没了。近年来,随着区域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妇女史研究的重心有所下移,社会下层妇女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9世纪末,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解放的大幕被揭开。有识之士在倡导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支持妇女参政、主张妇女经济独立的同时,也开始从人道主义、社会改良等角度,提出了救济妓女、婢女、童养媳等不幸妇女的主张和方法。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筹设妇女救济组织、妇女工厂等途径开展妇女救济工作。政府机构则通过颁布法令、建立妇女救济机构等方式,在妇女救济事业中逐渐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在妇女解放运动背景下兴起的妇女救济事业是如何开展的,与以往的妇女救济模式有何不同,救济效果怎样,对于下层妇女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清末民初,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妇女救济事业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从救济理念上看,以“卫道”为主旨、以“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妇女救济理念,开始向强调“寓教于养,教养兼施”的现代慈善救济理念转变,官民参与妇女救济事业的主要动因,从过去的保护妇女名节转变为国家、社会有责任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存权利;第二,主要救济机构从传统的善堂善会转变为现代的救济院,两者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救济内容和救济成效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三,救济对象从节妇、老弱病残妇女,扩展到娼妓、婢女、童养媳等不幸妇女。审视清末民初妇女救济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对近代慈善救济转型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探析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女性特别是下层社会女性所遭遇到的种种困厄。

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放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北京城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北京较早地开始了妇女救济事业的近代转型,并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妇女救济变革;二是,与晚清时期官方对社会公共事务控制弱化的普遍状况不同,政府在北京社会救济事业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民国建立后,北京主要的社会救济事业都改由政府统辖,民间举办的救济事业也受到官方日益严格的监管,因此包括妇女救济在内的社会救济事业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运行模式。这些都使得清末民初北京的妇女救济事业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本书的学术意义:第一,对北京妇女救济事业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推进学界对近代慈善救济事业转型的研究;第二,总结近代以来北京妇女救济事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探讨其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既有利于人们了解近代妇女救济事业的发展历程与面貌,又可以为透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对于下层妇女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 研究发展概况

有关妇女救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维新派代表人物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新认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倡导革除社会陋俗时,提出了反对纳妾、蓄奴等思想,并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虽然他们对这些陋俗的批判较为零散且缺乏理性分析,但产生的思想启蒙效应不容忽视。真正意义上的妇女救济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妇女问题研究深入,出现了一批关注不幸妇女救济的论著,如易家钺在《妇女职业问题》^①一书中谈及娼妓问题时,从社会、经济、人道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废除娼妓制度、解救娼妓的办法。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关于妇女救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难妇的救济。40年代以后,此项研究渐趋沉寂。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学术研究重新起步及社会史、妇女史研究兴起,有关妇女救济的研究有所展开。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②、罗苏文的

① 易家钺:《妇女职业问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第126页。

② 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①等著作,对不幸妇女群体及济良所、妇女救济院等近代妇女救济机构开始有所关注。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就此问题展开了一些有益的学术探索,如日本学者可儿弘明的《“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②,以香港保良局文书等资料为依托,考察了香港保良局对“猪花”和妹仔的救济情况,并借此剖析了保良局的半近代半封建性质,总结了殖民统治和救济事业的关系,使近代妇女救济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此后,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有关妇女救济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

(二)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通过前面简单的勾勒,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关于妇女救济问题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众多论著论及了妇女救济的方方面面,本书不可能全部予以介绍,以下择其要者,将其分成两个时期和若干个专题加以叙述。

1. 1949 年之前

关于妇女救济问题的研究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起步。这一时期,社会学家、女权主义者、法学家等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出发,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妇女问题的著述,并开展了对国内妇女问题的探讨,从社会救济、妇女解放等角度论述妇女救济问题的成果随之纷纷问世。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之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学界对如何救济不幸妇女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这一阶段,对于妇女救济的系统论述当推柯象峰的《社会救济》,该书第七章专论不幸妇女的救济。柯象峰在书中确定了“不幸妇女”的概念,即“凡贫困无以为生或被人虐待,因而失去普通公民所应受之自由的妇女”,分析了救济不幸妇女必要性,并给出了救济婢女、娼妓、妾的具体办法。他认为不幸妇女救济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女子价值得到社会实际的承认,使她们能够享有普通公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及生活,在此基础上,如果她们能够得到谋生的机会,就可以变为健全的公民。^③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救济体系渐趋衰落,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救济体系

①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日]可儿弘明:《“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孙国群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猪花”是指被卖往海外做娼妓的中国妇女。

③ 柯象峰:《社会救济》,上海:正中书局 1946 年版,第 153 页。

粗具规模。这一时期对于妇女救济机构的研究已经出现,如高迈的《我国贞节堂制度的演变》^①,首先分析了贞节堂制度产生的原因,然后以天津、保定两处全节堂为例说明贞节堂的大致运营情况,肯定其在救济贫穷寡妇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民国以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及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等因素使贞节堂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并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此外,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及各地方政府的社会局有关慈善救济工作的总结、报告等,也都包含了部分妇女救济机构的信息,如许晚成编写的《上海慈善机关概况》^②、陆利时主编的《上海特别市救济事业概况》^③、管欧编撰的《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④、北平妇女救济院出版的《北平市社会局妇女救济院概况》^⑤等。尽管这些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对后世有关救济事业的研究有启迪和铺垫作用,留下的史料更是弥足珍贵。

20 世纪初,娼妓、婢女、妾等不幸妇女的大量存在开始被看作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表征,是社会改造的必要对象,也是妇女解放必须扫除的障碍。于是从社会改造、妇女解放、改良婚姻与家庭、革除社会陋俗等角度探讨社会问题的文章,一般都会对这些不幸妇女群体有所涉及。这一时期有关娼妓群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专著方面主要有邝震鸣的《贫穷与妓女》^⑥、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⑦、鲍祖宝的《娼妓问题》^⑧等,其中鲍祖宝对救济娼妓问题论述较多。他通过分析指出禁娼与公娼制度存在的缺陷,认为应该把解决娼妓问题同女子职业问题相联系,并尽量避免娼妓增加。作为社会问题,娼妓、蓄婢、纳妾等问题受到了不少社会学学者的关注,《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等刊物上登载了多篇关于这些问题的论文,如步济时的《娼妓问题》^⑨、关端梧的《妾制研

① 高迈:《我国贞节堂制度的演变》,《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5 号,1935 年。

② 许晚成:《上海慈善机关概况》,上海:龙文书店 1941 年版。

③ 陆利时主编:《上海特别市救济事业概况》,上海:上海特别市社会局救济院,1942 年。

④ 管欧编:《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北平特别市社会局,1929 年。

⑤ 北平妇女救济院编:《北平市社会局妇女救济院概况》,北平:北平市社会局妇女救济院,1932 年。

⑥ 邝震鸣:《贫穷与妓女》,北京:北方印刷所 1930 年版。

⑦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 1934 年版。

⑧ 鲍祖宝:《娼妓问题》,上海:女子书店 1935 年版。

⑨ 步济时:《娼妓问题》,《社会学杂志》第 2 卷第 4 号,1925 年。

究》^①等。此外,随着社会学学科在我国大学教育中的引入,以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社会学系为学术阵地,一批以娼妓为考察对象的社会调查在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城市开展。西德尼·甘博的《北京的社会调查》^②对当时北京下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娼妓的生存状态及济良所的运行情况等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麦倩曾的《北平娼妓调查》^③、天津市社会研究所的《天津市妓户妓女调查报告》^④、郁维的《上海娼妓 500 个个案调查》^⑤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综合性论著中也有不少关于妇女救济的内容,如谈社英的《妇女运动通史》^⑥一书对中华爱国妇女会、妇女协会、妇女救济会等妇女组织给予了介绍,肯定了它们在救济不幸妇女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金仲华的《妇女问题的各方面》^⑦、周旋冠的《白话新书信》^⑧等都有关于救济娼婢等不幸妇女的论说。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慈善救济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开始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现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关于妇女救济问题的研究也有所进展,有学者在论著中辟专章对清末民初妇女救济机构予以评述,也出现了以妇女救济机构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以下从妇女救济机构和不幸妇女群体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分别加以介绍。

清节类善会善堂主要以贫苦节妇为救济对象,最早出现于清代中叶的江南地区,后来逐渐在全国推广,是传统妇女救济机构的典型代表。关于清节类善会善堂的研究,成就卓著者当属日本学者夫马进和台湾学者梁其姿。夫马进的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⑨第七章专门探讨清代的恤嫠会和清节堂。文中追溯了恤嫠会和清节堂的起源,并通过对清代几个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

① 关端梧:《妾制研究》,《社会学界》第 6 卷第 6 期,1932 年。

② [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 2010 年版。

③ 麦倩曾:《北平娼妓调查》,《社会学界》第 5 卷,1931 年。

④ 天津市社会局:《天津市妓户妓女调查报告》,天津:天津市社会局,1930 年。

⑤ 郁维:《上海娼妓 500 个个案调查》,《市政评论》第 10 卷第 9—10 期,1948 年。

⑥ 谈社英:《妇女运动通史》,南京:妇女共鸣社 1936 年版。

⑦ 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上海:开明书店 1934 年版。

⑧ 周旋冠:《白话新书信》,上海:广益书局 1932 年版。

⑨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清节类善会善堂的个案研究,较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些组织的经营实况及社会效用。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①一书,运用了明清两代大量的方志资料,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明末至鸦片战争以前各种慈善组织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的官僚化和儒生化过程与影响的论述,尤为深刻和精彩。书中第五章对清节堂、恤嫠会在维护儒生阶层价值观方面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类善会善堂的济贫功能是次要的,道德要求才最为重要,其经营方式折射出儒家社会的家族制度特征。遗憾的是,上述二者将研究视野集中在明清时期,均未涉及清末及民国的慈善组织。

中国大陆学者对善会善堂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有关于清节类善会善堂的专著出现,代表性成果多为学位论文。孙双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清节堂研究》^②依据地方志、清人笔记、报刊等资料,论述了清节堂兴起的原因、经营状况、堂内节妇的生活、社会功能以及民国以后衰败的原因。丛巍的《1912—1937 年天津妇女救济事业研究——以广仁堂为研究重点》^③,以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天津广仁堂为研究个案,阐述了民国时期天津的妇女救济状况,进而探讨了传统善会善堂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温乐平、涂蕴漪的《清代江西清节堂初探——兼与梁其姿先生商榷》^④对清代江西清节堂的建置、分布、数量、规模、管理等情况作了较为翔实地考察,同时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不当之处。王卫平的《清代江南社会问题研究:以逼醮、抢醮为例》^⑤一文,首先阐述了晚清江南地区出现的逼迫寡妇改嫁和抢夺寡妇的社会现象,继而指出这些事件的发生冲击了传统礼教和封建统治秩序,是促使清节堂建立的社会原因之一。他在文中还充分肯定了保节堂等机构在保护节妇方面发挥的作用。蔡凌虹在《从妇女守节看贞节观在中国的发展》^⑥一文,通过对保定府全节堂管理制度的分析,提出贞节堂是“助节所”,是清代贞节观念极度发展的副产品。

①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孙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清节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③ 丛巍:《1912—1937 年天津妇女救济事业研究——以广仁堂为研究重点》,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④ 温乐平、涂蕴漪:《清代江西清节堂初探——兼与梁其姿先生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⑤ 王卫平:《清代江南社会问题研究:以逼醮、抢醮为例》,《史林》2003 年第 3 期。

⑥ 蔡凌虹:《从妇女守节看贞节观在中国的发展》,《史学月刊》1992 年第 2 期。

济良所主要以娼妓为救济对象,兼及婢女、妾等不幸妇女的救济。济良所最早由基督教传教士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后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陆续建立。目前学术界关于济良所的研究总体数量不多,而且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

比较而言,有关上海济良所的研究成果最为深入全面。Sue Ellen 的博士学位论文 *Encountering Hope: the Door of Mission Hope in Shanghai and Taipei 1900—1976*^① 涵盖了上海济良所自成立到迁移台湾以至最后解体的全部过程,是目前所见的关于上海济良所最为全面的研究。全文以时间为序,分七个时段,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对上海济良所的发展、管理、运行等情况加以论述,最后一章总结回顾了上海济良所70多年的发展历程,评价了其所做的工作,分析了其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济良所给中国的妓女救济工作及传教事业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含义,不但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改变了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的行为方式。何孔蛟在《拯救娼妓的慈善机构——上海济良所》^②一文中,从上海济良所的建立和发展、运行和管理及济良所内妓女的归宿三个方面,对上海济良所进行了综合论述,并指出济良所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公益性措施,不能消除产生娼妓的社会根源,也不可能阻止和减少拐卖妇女为娼的恶行。

齐小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北京济良所研究(1906—1929)》^③,首先分析了北京济良所建立的社会背景;其次从妓女入所原因、济良所对入所妓女的保护和教养及“所女”出路三个方面,论述了北京济良所的运营情况,其中还从制度角度对比了京沪济良所的异同;最后阐述了济良所从“商办”到“官办”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制约济良所发展的因素。他认为无论是从教养方法还是从出路上看,由济良所到妇女救济院救娼部的转变都体现了娼妓救济事业的进步。丁芮的《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

① Sue Ellen Gronewold. *Encountering Hope: The Door of Mission Hope in Shanghai and Taipei 1900—1976*,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济良所的英文名为 Door of Hope, 因此也称“希望之门”。

② 何孔蛟:《拯救娼妓的慈善机构——上海济良所》,《档案春秋》2007年第3期。

③ 齐小林:《清末民初北京济良所研究(1906—1929)》,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女习工厂为例》^①一文,通过对京师警察厅下辖的妇女救济机构——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的论述,揭示了京师警察厅在救济不幸妇女方面所做的工作。

任丹凤在其硕士学位论文《20 世纪 20—30 年代奉天慈善机构的养女救助研究》^②中,从奉天慈善机构的沿革、养女救助的相关法规、救助机构的资金来源及养女的救助机制四个方面,论述了奉天慈善机构在养女救助方面所做的诸多努力,肯定了养女救助对维护社会稳定、改良社会风气及保护养女群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王琦、蔡勤禹的《民国时期的青岛济良所》^③一文,对青岛济良所的组织机构、经费来源、管理制度进行了考察,并总结了该所的特点及发挥的作用。黄鸿山的《清末济良所的出现与推行》^④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篇对济良所的渊源及在各地的运行实态进行较为全面考量的文章。该文追述了济良所出现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北京、天津、镇江、宁波四地济良所为例,说明济良所的推行和运营状态。他认为虽然济良所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但这种由西方移植来的慈善组织,当时已经融入中国社会,成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内政部颁布了救济院管理规则,对贞节堂、济良所等慈善救济机构进行合并改组,成立了新的管理规范的妇女救济机构。南京、北京、天津等地都成立了妇女救济院,作为救济不幸妇女的专门机关。妇女救济院作为独立运行的救济机构,虽然存在时间较短(后来多数归并于社会局救济院,作为一个从属部门存在),但其所体现的现代救济理念、管理模式及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李少兵、王明月的《“教育救济”:1917—1937 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⑤以北平妇女救济院和香山慈幼院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教育救济”在近代慈善事业中的应用,反映出这一时期北平慈善界对“完善教养”理念的创新与实践。董丁瑜的《1928—1937 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一文,以北平妇女救济院、北平妇女协会及香山慈幼院为研究

① 丁芮:《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② 任丹凤:《20 世纪 20—30 年代奉天慈善机构的养女救助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文中所说的养女主要包括逃妾,受虐待的贫妇、婢女,不愿为娼的妓女等。

③ 王琦、蔡勤禹:《民国时期的青岛济良所》,《济宁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④ 黄鸿山:《清末济良所的出现与推行》,《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3 期。

⑤ 李少兵、王明月:《“教育救济”:1917—1937 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个案,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官方和民间的妇女救济机构及其救济活动分别进行了阐述,并对北平妇女救济的成效给予评价,认为各式妇女救济机构“虽然规模有限,救济成效欠佳,但却在救济理念和救济方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展现出具有现代性质的妇女救济机构的一些特征”。^①

中国救济妇孺会以打击拐匪、救济迷拐妇孺、促成亲人团圆为宗旨,于1913年在上海成立。民国时期,该会在救济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随着学界对民国时期地方史、慈善史研究不断深入,中国救济妇孺会逐渐引起了中外史学家们的关注。日本学者岩间一弘于1999年发表的《简论民国初期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一文,是目前所见的关于中国救济妇孺会最早的专题研究成果,对这项研究思路的拓展功不可没。该文对中国救济妇孺会的创设与管理、创办者的慈善观念以及该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肯定了该会在妇孺救济方面发挥的作用。谢忠强的《慈善与上海社会——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视角(1912—1937)》^②一文,借助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理论,分析了中国救济妇孺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对该会成立的具体过程、组织概况以及运转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他在对中国救济妇孺会的救济成绩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考察了上海华租两界的行政当局、普通民众及全社会对中国救济妇孺会的社会认可程度,最终落脚于“慈善与上海社会的互动”这一全文的主题上。邱淑娥在《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研究》^③一文中,从创立缘起、组织体系、经费筹集、事业运作及对外关系几个方面,展示了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的面貌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以此折射出民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实际变化。此外,谢忠强的《中国救济妇孺会慈善工作述评(1912—1937)》^④、《民众、社团与国家:关系语境下慈善组织的社会定位——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中心的文本梳理》等文章,也都是关于这一机构的研究成果。

① 董丁瑜:《1928—1937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 谢忠强:《慈善与上海社会——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视角(1912—1937)》,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③ 邱淑娥:《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④ 谢忠强:《中国救济妇孺会慈善工作述评(1912—1937)》,《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民众、社团与国家:关系语境下慈善组织的社会定位——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中心的文本梳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除以上关于妇女救济机构的专题论述外,很多关于慈善救济的论著也都从多个角度关注了妇女救济事业。在专著方面,周秋光、曾桂林合著的《中国慈善简史》^①在介绍明清慈善事业发展时,对清节堂、恤嫠会有所涉及。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②一书,在对国民政府的社会救济工作进行系统梳理的过程中,从政府的政策法令、院内外救济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妇女救济活动作了简要论述。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③一书中,对天津广仁堂的创立缘由、过程及其救济活动有所论及。

在论文方面,张礼恒的《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④一文,通过对比清节堂和济良所的救济理念,总结出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事业对西方近代慈善救济理念“由排拒到认同”的特点。岑大利在《清代慈善机构述论》^⑤一文中,介绍了清节类善会善堂的建立方式及管理制度,认为清节堂中的种种规诫是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压制和残害的表现。熊秋良的《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⑥对清代湖南地区部分清节堂的建立时间、收养人数、被救济人员待遇及规模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对同治以后湖南地区清节堂增多的原因作出解释。他认为,湖南作为湘军的起源之地,湖南籍士兵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死伤无数,导致寡妇增多。为了救济士兵的遗孀,湖南地区的清节堂日渐增加。任云兰在《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津京地区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近代城市贫民阶层及其救济探析——以天津为例》^⑦两篇文章中,对天津广仁堂在救济妇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进行了探讨。

①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

⑤ 岑大利:《清代慈善机构述论》,《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⑥ 熊秋良:《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

⑦ 任云兰:《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津京地区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近代城市贫民阶层及其救济探析——以天津为例》,《史林》2006年第2期。

王玲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申报〉(1872—1911)的慈善文论看晚清慈善思想的变迁》^①,以《申报》为研究点,探讨了时人对清节堂的一些看法。她认为清节堂和恤嫠会等机构不仅是儒生宣传其价值观的渠道,也是守贞妇女实现其愿望的理想之处。刘宗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社会救济研究》^②,在对上海同仁辅元堂、四明公所及天津广仁堂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变化及政府的应对之策。王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北京慈善救济研究》及专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③中,在对北京慈善救济事业进行综合梳理时,对北京济良所及北平妇女救济院救娼部的沿革、管理、运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内容都有所论述。此外,李国林的《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④,王宏伟的《晚清北京社会救济制度研究》^⑤,刘荣臻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社会救助研究——以1927—1937年为范围》^⑥等,对于上海、北京等地的妇女救济事业也分别予以了关注。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底层社会开始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与此同时,在妇女史研究勃兴的推动下,有关下层妇女的论著大量问世,其中不少论著涉及了底层妇女群体的救济问题。

娼妓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群体之一,也是妇女救济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学界有关娼妓群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法国学者安克强在其所著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⑦一书中,辟专章论述了上海济良所和妇孺救济会的妇女救济活动,并从妓院管理严格、妓女对外界无知等角度,分析了到济良所求援的妓女人数较少的原因。美国学者贺萧在《危险的愉

① 王玲:《从〈申报〉(1872—1911)的慈善文论看晚清慈善思想的变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 刘宗志:《清代社会救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③ 王娟:《清末民初北京慈善救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⑤ 王宏伟:《晚清北京社会救济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⑥ 刘荣臻:《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社会救助研究——以1927—1937年为范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⑦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雯铭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